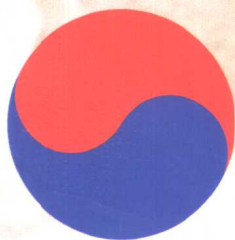


复 旦 大 学 韩 国 研 究 丛 书

韩国研究论丛

(第八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研究论丛

(第八辑)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研究论丛. 第 8 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9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5004-3096-5

I. 韩… II. 复… III. 韩国-研究-文集
IV. K31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862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73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批信仰奇怪宗教的神秘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

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 50 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 50 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

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

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为对方打开门户以后，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是否别后无恙；然后则是急切地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与朴实，肯定要复杂得多。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此以后短短的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或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环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予那么多的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那么几条理由，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内容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她自己独到

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习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颇为重要。

其三，在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因而结下了互助互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血肉之情。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共同的珍贵历史遗产。

其四，中韩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 30 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地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须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也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

正是从这种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等方面。现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

套丛书。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庄锡昌

1997 年 10 月 14 日

内 容 简 介

本辑是反映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的专辑，主要围绕朝鲜战争，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韩国独立运动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韩伦理观念学术交流，以及韩国的历史、文化等专题，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文中多有精辟和独到的见解。

目 录

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影响	徐 焰 (1)
冷战后朝鲜半岛新均势确立的历史回溯	金重远 (13)
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及发展	
前景	[韩] 尹大奎 (26)
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及其对未来安全的	
影响	金光耀 (37)
跨世纪朝美关系回顾与展望	于美华 (47)
韩国政府政策评价制度的变迁及现状	[韩] 曹利铉 (58)
金大中政治思想与韩国政党政治的转型	陈周旺 (76)
“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 中韩学术研讨会	
综述	章 红 (90)
东北亚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蓉 黄 静 (99)
冷战以来的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王天广 (110)
二战结束前夕国民政府对韩政策新探	符常俊 (122)
孙贞道与韩国独立运动	谢俊美 (141)
上海韩人学生与韩国独立运动	孙科志 (150)
邵毓麟与韩国独立运动	[韩] 曹恩惠 (161)

《申报》有关韩国独立运动暨中韩关系史料

述评 石源华 (177)

近代中韩民教关系比较研究 戴鞍钢 (208)

金日成与朝鲜基督教 邵 雍 (216)

退溪与栗谷哲学异同点之比较 洪 军 (227)

论韩国诗人许世旭汉语诗歌中的儒家情境 苏保华 (239)

高丽国义天法师入宋拜访诸名僧 崔凤春 (262)

高丽末期的田制改革及其社会效果 李春虎 (294)

大院君三次摄政再探讨 王玉洁 (309)

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简介 (332)

复旦大学韩国/朝鲜研究中心大事记

(2000年7月—2001年6月) (341)

抗美援朝战争对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影响

徐 焰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在东邻的朝鲜便发生了战争，美国的侵略威胁迫使中国出兵参战。这场战争是中国进行的第一场世界型的现代化战争，它虽然改变了原定的国防工作的进程，却也从另一方面刺激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展开，使新中国领导人加深了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对此后许多年的中国国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新中国原来的国防规划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经历了长达 22 年之久的武装斗争，却主要处于农村根据地的落后环境之中。新中国建立时，人民解放军全军总兵力有 460 万人（随后因收编起义部队，至翌年春达到 550 万人），却基本上是陆军，其建制有 16 个兵团、61 个军，却主要装备轻武器，少量重武器（主要有 2.4 万门火炮、410 辆坦克）差不多都是战争中缴获的外国陈旧产品。刚刚开始组建的空军只有 60 架缴获的破旧飞机，人民海军接受的 4 万吨舰艇也多属外国老旧产品，还有清朝遗物。此时

国内的兵工厂连迫击炮都难以制造，一年的弹药生产能力只能达到1万吨，其中主要还是步机枪子弹、手榴弹等。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德等国的军火年产量都达数百万吨。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军队又已跨入了装备原子武器、喷气式飞机的时代，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却连一架飞机、一艘战舰、一辆坦克和一台机动车都不能生产。

建国之时，国家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又只占10%，90%的人口生活在生产方式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农村。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1]从1949年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来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工业产值在国际上排名第26位，不仅远不及葡萄牙等西方小国，也不如东方的原殖民地国家印度。195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合计只有446亿元，按当时的比价约折合100亿美元，人均不足20美元。而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400亿美元，人均达1600美元。

国家的落后又突出表现为科教水平的落后。解放时全国人口中有80%是文盲，有初中以上学历者只有1%略多。一个由千疮百孔的小农经济支撑着的、科学文化极其落后而又有近6亿人口的国家，就是进行各项建设的起步基点。确如陈毅于1945年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即使到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中国比之西方发达国家还要落后百年至一百五十年。开国大典时，毛泽东也表示既愉快又不愉快，他后来对此解释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2]

解放之初，共和国急需进行彻底改变国家面貌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进行和平建设又需要安全稳定的环境条件。当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周边环境也不安定，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

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3]人民解放军需要由一支装备极其落后的单一陆军转变为合乎现代战争要求的合成军，同时国家需要建设工业化的基础，这又迫切需要裁减军队，省出经费恢复国民经济。

在建国前夕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一直把恢复国民经济摆在第一位。在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公开以日本为假设敌，事实上此时战败的日本并无军队也未恢复国力，并处于美国占领之下，中苏两国事实上是以美国为战略对手。不过俄罗斯近年公布的档案也证实，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时，都认为近期不可能发生两大阵营间的大规模战争。毛泽东在同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仍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4]出于这一认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虽然一开始就以美国为主要防范对手，却是立足于长远准备而并未准备很快对美作战。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所担负的三项主要任务中，剿匪和进军西藏基本可依靠当时已有的陆军，进行台湾战役的关键却在于有海空掩护，加上为保障经济恢复急需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防空问题，因此新中国的新技术兵种建设将空军列为第一位。自1949年8月与苏联签订了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空军的协定后，采取了先办校、后建部队的方式，突击培训空勤和地勤人员，预定在1950年训练出900余名飞行员，装备作战飞机400余架，在数量上较台湾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1950年6月毛泽东还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飞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就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尤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5]这一年空军建设的开支即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

当时海军建设放在新技术兵种建设的第二位，1949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海军领导机关。翌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定对华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其中一半用来为海军购买装备，并要求于1951年春季以前交货。

对于陆军，此时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都提出了减少数量和提高质量的原则。不过鉴于财力有限，加之感到现有装备已能完成消灭残敌的陆战任务，因而除了从1949年末开始进口用于防空的高射炮外，还未购买坦克、地面火炮等重装备。1950年5月中央军委还决定，将全军由550万人于年内裁减至400万人，并准备第二步减至280万—300万人。

从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国防建设的总体情况看，军事建设的基本目标只是完成台湾战役、进军西藏等当前任务，建设一支世界先进的国防军的理想还仅作为远景目标而未制定具体规划。

二 根据出兵朝鲜的急需进行国防建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新中国迅速改变战略重点，国防建设在战争期间主要是按照应急需要而不是长远计划来实施。

朝鲜战争开始时，东北地区因土匪已肃清且三面环绕友好国家，在全国是兵力最少的一个战略区，只有22万军队。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6月底中共中央确定：“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6]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和政务院联合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指出：“复员工作的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7]这说明尽管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共中央仍然希望这一战争不影响国民经济恢复的大局，因此继续进行复员。

同年7月上旬，中央军委召开国防会议后确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此战略重点向中朝边境转移。8月间看到朝鲜战局可能恶化，陆军的复员工作中止。在8月26日军委的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各军兵种都要编制三年规划，同时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年底前组训完成4个飞行团、3个战车旅（9个团）、18个高炮团和10个军的队属炮兵。后来由于入朝作战，加上资金外援训练等方面的困难超过预想，各军兵种编制的三年建设规划在执行时都有很大变化，如海军停顿了多数建设项目而让出经费给空军，各兵种在年底之前也未能完成原定组训任务，不过这一计划毕竟是新中国首次将军事建设的长远设想与现实计划相结合，在国防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志愿军入朝之后，在前五次战役中主要靠步兵作战，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却也难于大量歼灭敌军，并随着战争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前线火力不足、后方防空力量差和后勤供应困难的弱点。为了解决战场急需，中共中央确定了对技术兵种“边打边建”的方针，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又以空军、炮兵（包括高射炮兵）为重点。为此，通过大量进口苏联装备，空军组建了23个航空兵师，炮兵新组建了20个师（战前原有4个师），其中大部分都投入了朝鲜战场。

中国出兵朝鲜之初，国内陆军也进行了大扩编。当时中共中央虽争取战争“地方化”，却也准备美国对华正式宣战，并防备美军与台湾国民党共同登陆东南沿海地区，为此毛泽东还要求将驻广东部队由现有3个军增至7个军，^[8]沿海其他各省也增加了兵力。同时，中共中央对世界战争的看法也一度有了些变化，提出，我们要力争和平，但也要准备应付世界大战。^[9]为了应付最严峻的情况，人民解放军由入朝参战前的513万人增至1951年秋天的611万人（包括以志愿军名义在朝部队）。同年国防费用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48%（财政开支统计中为44%，

还有其他特别支出费用)。这样，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排序上，第一位是国防，第二位是稳定物价，经济建设放到第三位。

入朝后通过与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美军较量，中央军委又深切感到不仅要改善装备，还要克服国内各部队来自不同山头造成的制度不统一、装备杂乱无标准和现代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缺陷。1951年初中央军委成立军委的兵工委员会，组织全国的武器生产，随后并按苏式装备标准建立了全军统一的武器序列。同年发布了全军的各项条令，并按统一编制整编了部队，各级军官也按初、中、高级的标准进行院校培训。尽管这时的武器生产和训练整编还带有一些战争应急性质，却也迈出开发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朝鲜战场上为时8个月拉锯式的运动战结束后，中共中央至1951年夏基本摸清了美军实力的底，认为虽无法解放全朝鲜，却可以坚守住三八线附近战线。麦克阿瑟被撤职及美方要求和谈，也证明了战争不大可能扩大到朝鲜之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在国内可以缓解临战状态，在狭长的朝鲜半岛部署数量过大的地面部队也施展不开，于是于1951年11月决定重新开始精简整编工作，确定将全军部队压缩到350万人，在朝鲜的部队也由115万人减少至89万人。后来因战争情况有所变化，这一计划未完全落实，1953年初人民解放军总数还有460万人（其中有40万是待处理的伤残和编外人员），在朝部队因进行反登陆准备又增至130万人，不过在战争后期逐步裁减军队这一总的趋势却已经确定。

由于大幅度减少军队及国家收入增多，1952年的国家财政支出内国防费已降至33%，经济建设费用已占第一位。在同一年，毛泽东还认定朝鲜战争将走向和谈解决的发展趋势，由此确定在战争未结束前就开展全面经济建设，并断言：“说马上要打第三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事业，打

下强固的基础。”^[10]

根据准备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考虑，再通过朝鲜战场同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美军作战的实践，1952年5月，中央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制定了国防建设五年计划。这一计划的重点是减少步兵，增加特种兵，特别是增加空军、炮兵和装甲兵。如空军飞机要发展到6200架（增长一倍半），不仅稳居世界第三位，还要超过远东美军飞机的数量。由于这时还不具备研制核武器的条件，计划中发展的还是一般的常规武器，却也在计划拟定时酝酿过研究特种武器的问题。后来的实践证明，要完成这一计划所需的金额过高，与经济建设的要产生矛盾，不过还是反映出军委领导把技术兵种建设放在军队建设首位的观念已经牢固树立，并开始制定比较长远的规划。

三 根据现代战争经验实现建军战略转变

1953年7月朝鲜停战，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从此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为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改变了过去长期带有游击性的不正规、不统一的状况，基本完成了编制的统一，并按照苏式标准实现了全军大部分部队的装备制式化（所余少数部队也在1955年以前完成换装）。与革命战争时期各战略区的部队自行编组、使用“万国牌”杂式武器的情况相比，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由建军的低级阶段迈入了高级阶段。

朝鲜停战标志着军队进入和平时期的建设，此时鉴于国内经济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毛泽东于停战后马上提出军政开支不能超过国家财政支出的30%。1953年8月，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决定进一步减少军队数量，并修改一年前的国防建设五年计划。1953年末至1954年初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